

珍贵文物记录历史瞬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珍贵文物故事

黄黎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开幕，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及1726名顾问、专家、秘书出席会议。

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物，记录了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这段往事……

董必武代表中共参会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逐渐迎来胜利曙光，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三国和中、美、英三国的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拟定成立一个国际性机构，来负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945年春，中、美、英、苏决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大会，为尝试建立永久和平的战后秩序而努力。

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立即在会上提出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派人出席。中共中央起初向国民党当局建议派周恩来、秦邦宪和董必武三人参加旧金山会议，但国民党企图一党包办，执意不肯。

为此，周恩来于1945年2月18日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时要求将该意见转告罗斯福总统：“当我在重庆时，你曾告诉我，派赴旧金山会议的代表中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影响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在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居中调和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经过讨论，中共中央决定派党的元老、知名法学家、又懂英语的董必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此次确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共10名，首席代表为时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有：时任驻美大使魏道明、时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前驻美大使胡适，中共代表董必武，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李璜、吴贻芳，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议员）张君勱，时任大公报社总经理胡霖。

董必武成为关注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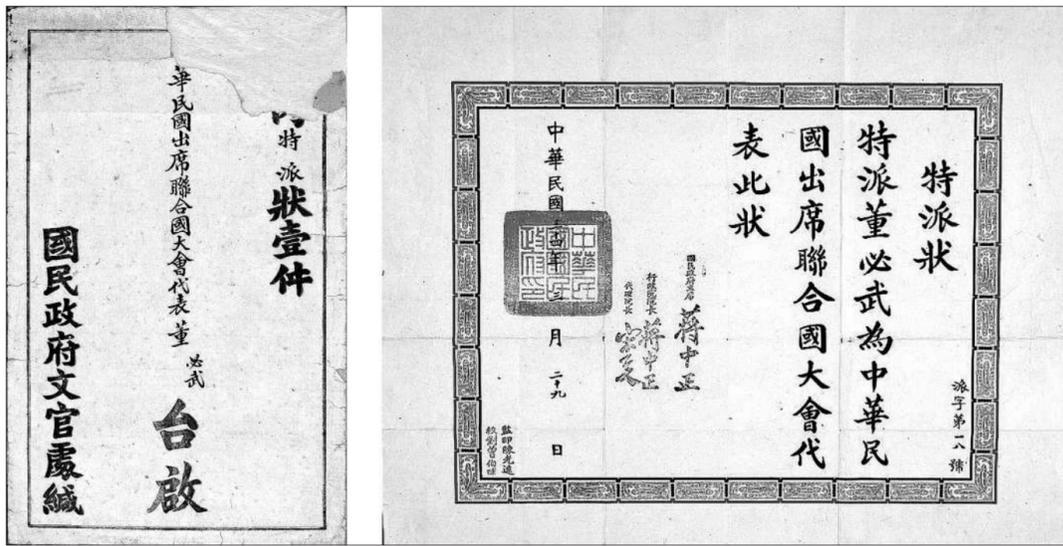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1945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发给董必武的特派状，写有“特派董必武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此状（派字第十八号）”。特派状，纵41.3厘米，横50.7厘米，纸质，石印，毛笔书写。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1945年4月6日，延安机场人声鼎沸，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陈毅及社会各界人士数百人，喜气洋洋地到机场欢送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乘飞机前往重庆转机。

1945年4月12日，董必武偕秘书陈家康、章汉夫在珊瑚坝机场乘中航机39号，王若飞、钱之光、王炳南、廖梦醒、乔冠华、徐冰、张晓梅、龚澎等人到机场送行。董必武等人乘坐的飞机经印度、转中东、跨非洲、横渡大西洋



在旧金山参加会议的董必武



国民政府委派董必武为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的特派状（派字第十八号）

到达巴西，然后北上，辗转10天，于4月21日与胡霖等同时到达纽约。

在印度机场转机时，董必武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问：如果盟国友人提出中国能否团结一致时，你将如何回答？董必武当即告之：吾将告诉盟友，中国现在正向团结之途努力中，余望其能达到目的，中国政府亦向民主之途前进，余希其努力迈进。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开幕，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及1726名顾问、专家、秘书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于1945年5月1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招待会由宋子文主持，600多名记者蜂拥而至，董必武自然成

为记者关注的焦点。在两个多月的会议过程中，董必武以庄重而平和的政治家风度，给当时许多著名人物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良好印象。

珍贵的文物

平日里，董必武是出了名的节俭，日常衣物不仅陈旧还打着补丁。出发前，董必武听从章汉夫等人的建议，在重庆赶制了一件咖啡色的长款呢料双排扣大衣，简朴低调又不失庄重，同时还购买了一套非常便宜的西服。

但熟悉西方外交礼仪的章汉夫表示，穿上这套西服出席国际会议可能有失外交礼仪，实在不妥。就这样，在到达纽约的第二天，董必武拜托华侨日报社的同志，

又花了25美元购置了一套西服。

在美期间，董必武将节省下来的1240美元生活费、200美元交际费，全部用于购买印刷机、打字机等以支援上海的党报和新华社通讯社筹建工作。《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1945年6月25日，旧金山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26日，举行了签署宪章的正式仪式。按照四个邀请国英文字母的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代表签字用的是具有鲜明中国传统特色的笔、墨、砚等文具。每位代表签字完后即返回原处肃立，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共8人（宋子文和胡适因故未参加签字仪式）分别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代表团的签字仪式历时15分钟。

为了扩大影响，董必武主持编写了用英文写成的小册子《中国解放区实录》，分发给各国代表、外国记者，较详细地向世人介绍了解放区军民在抗击日寇、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就。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拜访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和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等。

董必武还走进唐人街的华侨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等，向侨胞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各项政策，争取到华侨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1945年11月20日，董必武乘飞机回国，于26日抵达重庆，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赋予他的重大历史使命。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Z 履痕处处

龙头山的故事

肖甲文

在宁古塔将军旧城遗址以东不到2公里的海浪河边，有一个孤立的小山包，这就是龙头山。它高不过10米，略呈方形，顶面平坦，西北两侧是断崖。从东面缓坡上去，环望四周，沃野平展，海浪河呈网状流过。唯其东南，有丘陵山山相连绵延而来，像一条巨龙低下头来，到海浪河中汲水，因此当地也有龙头山的传说。

龙头山又被称作点将台。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座小山是古代的军事城池遗址。如今，仍然能够在其南面崖下看到古代堽壕遗址：它的东北两面山下的土包，就是夯土墙的遗迹；环山四周，有明显的马道遗迹。

龙头山本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然而，“山水固以人传”，清初以来，关内流人到此生活，或咏之以诗，或载之以文，才使得龙头山众多的名字和故事得以流传下来。

龙头山又叫宁古台，为满语“六个”之意，相传古代曾有清朝皇族远祖六兄弟居于此。张缙彦《宁古台》一文中说：“宁古塔者，命其地也。其山则曰台，塔与台音相近也，或以山形如台，故名。老人言：百年前居民不过数家，依山而居，后移此城，故至今仍之。”这说明先有宁古台，后有宁古塔。

明初，这里是东海窝集部宁古塔路；1636年，清政府建驻防城即宁古塔旧城；1653年，设昂邦章京，1662年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由此可见，宁古塔既是古城名，又是地域名，也是官职名，还是一段历史的代称，而这一切都源于宁古台。

宁古台也是当年流放文人经常饮酒赋诗的场所。1661年九月初四，因人工出资修缮北京前门城楼，方拱乾一家将被赦还南归，张缙彦、吴兆骞等18人在宁古台设宴饯别。此时，恰有一只雉鸡飞落被捕，便将雉鸡拿到西北崖上放掉，并将此崖名为“放雉崖”，还当场赋诗《放雉》两首，其中一首为：“万物爱生还，飞飞任故山。自经罗网苦，益显天地闲。呼侣风楼外，哺雏野草间。凌霄虽翼短，早已迈尘寰。”返还故里后又写下《忆雉》一诗：“笮外有天地，山梁霜雪春。别时犹顾我，行处未逢人。曾否故巢在，应疑旧羽新。花根见余粒，爪印印阶尘。”不难看出，方拱乾对放雉崖的一片情怀。10年后，张缙彦又看到了方拱乾的诗，想到其已歿5年，不禁热泪盈眶，执笔写下了《游宁古台记》：“坦庵取得雉难纵之，因名其处曰放雉崖，志不忘也。”“放雉崖”的故事也一时成为美谈。

2013年，海林市将其与宁古塔旧城遗址一同申报国家文保单位并被批准。如今，龙头山依旧伫立在那里，随着这些诗文和传说名传后世。



宁古台旧址远景

Z 宝藏物语

工艺高超“千佛缸”

张文敬 邢志明

登州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千佛莲台，质地以青铜原料为主，兑铅、锌、铝合金铸造而成，通体高99厘米，口径51厘米，最大胸径71.5厘米。自上而下分别铸有二十层座佛像，每层五十尊，是寺庙中高大的千佛莲花底座，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根据其形制，谓之“千佛缸”。

仔细观看“千佛缸”上存在的造像，雕工精湛、栩栩如生，大部分造像均有题名。千佛莲台出土于北沟镇北林

院。《道光重修蓬莱县志》中记载：北林寺，城西三十里。据寺中原存的古匾记录，老寺院毁于战乱，后于“明永乐年间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寺毁僧亡，今已辟为良田。

如今在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北京法源寺和北京万寿寺等地，都有青铜鎏金的完整造像，其中矮的三四米，最高的达到三层、七米之巨。千佛莲台虽已残缺，但经过专家推测，复原出的造像应是穿着华丽的华服，手里做着盛开莲花的手印的形象。



千佛莲台，明，高99厘米，口径五十一厘米，最大胸径七十一厘米。登州博物馆收藏。



大会发给董必武的纪念章



董必武的皮鞋和名片

